嵌入与互助：三线建设中工农关系的微观审视

崔一楠，赵 洋

（西南科技大学 政治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摘 要： 20 世纪 60 年代，绵阳成为四川三线建设的重镇。进驻绵阳的三线企业和科研院所带动了当地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农业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农村集体经济和卫生文化事业的发展，给农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新变化。与此同时，广大农民掀起了支援三线建设的热潮，在参加基本建设、生产地方性建材、保障蔬菜供应等方面出力颇多。三线建设中的工农关系尽管存在矛盾，但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问题得到解决，偏差得以纠正。工农互惠关系的构建为推进西部地区工业化及战略大后方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给处理新时期的工农、城乡关系提供了历史启示。

关键词： 三线建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西部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16)01－0134－07

20 世纪 6、70 年代，为有效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尽快改变国内工业不合理布局，中共中央在中西部地区的十多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国防、工业、科技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史称“三线建设”。近十几年来，随着相关档案的开放和文献资料的出版，以及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行，三线建设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形成了不少研究成果。综合来看，学界对于三线建设的研究主要涉及决策背景、区域布局、实施过程、影响评价、调整改造、经验教训、与领袖人物的关系、与西部城市现代化的关系、遗址保护、职工民生等等[1]。已有的专著和论文拓展了三线建设的研究视野，丰富了研究内容，然而在这些成果中，却缺乏对工农互动关系的应有关注。三线建设时期，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就如何处理工农关系进行了反复的思考和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会让我们以新的视角来审视三线建设，并为新形势下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为此，本文尝试以四川绵阳①为个案，考察三线建设给“三农”领域带来了何种影响，农民又为三线建设做出了哪些贡献，各方如何解决影响工农关系的问题。

一、以工促农：三线建设对“三农”的带动

自 1965 年起，一批部属、省属工矿企业和科研院所相继在绵阳开工建设，按照中央“工农业并举”的方针，这些三线单位在搞好自身建设的同时，还需做到“厂社互助，定点支农”。这一要求被视为“工业生产建设上的一个革命”[2]，是巩固工农联盟，缩小“三个差别”的新尝试。为此，绵阳的三线单位对支援农业生产倾注了相当的热情，他们分担了地方政府在发展农业上的部分职能，增加了当地的农业要素投入，在财政收入有限和工农资金分配格局既定的条件下，实现了一定区域

收稿日期： 2015－07－26　　**DOI：** 10.7671/j.issn.1672－0202.2016.01.0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5CKS004)；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15sd1108)

作者简介： 崔一楠(1983—)，男，辽宁锦州人，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学。E-mail：cly411@163.com

① 本文所论之“绵阳”，是指三线建设时期，位于四川省北部的“绵阳专区”及更名后的“绵阳地区”。1968 年 7 月，绵阳专区更名为绵阳地区，所辖范围不变。为行文方便，涉及“绵阳专区”、“绵阳地区”称谓时统一称“绵阳地区”。

内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从 1965 年到 1966 年，第二重型机械厂、德阳水电设备厂、东方电机厂、长城钢厂累计提供资金 120 余万元，用于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和土壤改良[3]。绵阳县多个公社的水渠因年久失修及设计缺陷，“跑冒滴漏”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651 工程（清华大学绵阳分校）指挥部了解情况后，派出勘测小组重新规划水渠路线，调集人员加班加点施工，解决了农民的“用水难”问题[4]。类似这样支农惠农的事例还出现在江油县，1966 年上半年，三线职工参与修建提灌站 31 处，延伸水渠 7435 米，使 34000 多亩农田受益。此外，他们还援建农具修配厂 1 座，赠送机电器材 6000 余件[5]，提高了当地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当出现自然灾害时，三线单位反应迅速，在救灾扶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 1966 年春，绵阳发生严重旱灾，第四冶金建设公司紧急筹措了 2700 元提供给受灾较重的向阳公社，并组织 1428 人次投入抗旱，一个月时间共修筑拦河堤坝 854 米，铺设水管 4740 米，安装水泵 50 余台[6]。

除资金、设备、人员外，三线建设者在科技兴农方面也做出了贡献，他们凭借与沿海地区交流机会多，信息获取快的优势，积极将一些新型农业科技成果介绍给农民。1966 年，江油长城钢厂从上海购入水稻良种 500 斤，派有经验的工人在阳亭公社指导农民试种[5]，此后该厂职工又将新式的半旱式育秧技术带回绵阳，这一技术具有秧苗成活率高、秧龄弹性大、插秧后返青快等优点，获得了农民的广泛认可。西南金属制品厂职工与文胜公社社员配合，研发出快速培育红苕苗的新方法，经过农业部门鉴定后在全县推广。1967 年，第四冶金建设公司将农垦 58 号早稻引入绵阳县城郊公社，该品种在分蘖能力、耐肥抗倒、抵御病虫害、单位产量等方面都比原有水稻表现优异。在传统的农业生产场域中，劳动者文化素质低、信息闭塞、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等弊端严重制约了农业科技的推广普及，三线建设者在补充农业发展短板上发挥了独特作用，他们成为农民获取外部科技信息的重要媒介。

三线建设使农民受益良多，然而工业的带动作用并非仅限于此，它还壮大了农村的集体经济，增加了农民的货币收入。计划经济时代，农民从非农产业获得的货币极为有限，货币收入主要来源于向国家出售农作物。三线单位的进驻为农民增收拓宽了渠道，使他们有更多的资金来购买工业产品及改善生活条件。1965 年，绵阳县青义公社有数百名农民参加“三通一平”（通路、通电、通水和平整场地），公社因此增加收入约 34000 元，与 1964 年相比，100 个工分的价值提高了 0.5 元[4]。1967 年初，成都至德阳输气管线工程破土动工，德阳县城南、八角公社承担挖掘管沟的任务，社员们普遍反映，大多数三线单位支付的工资比一般单位高，他们用这些钱买了化肥和农药，农业投入比 1966 年增加了 3 倍，社员们都说：“参加支重劳动拿钱回来，不但虫害问题解决了，还评了工分，油盐钱、零用钱也都有了。”[7] 1969 年到 1970 年，在江油的普通生产队里，10 个工分的价值约合 0.4 元，而三线企业、科研院所周边的生产队通过帮助这些单位搞基建、烧砖瓦增加了收入，10 个工分的价值可达到 0.6 元到 0.8 元[8]。

三线建设者对农民的生活也十分关心，每逢年节，各单位便会到附近公社走访慰问，与农民一起联欢。1966 年春节前夕，德阳县的三线企业为让农民过好年，组织职工给农民修补房屋，粉刷墙壁，安装电灯[3]。剑阁县三线职工在协助农民搬迁时，担心他们的粮食被雨水淋湿后发霉变质，便将自己的外衣脱下盖在粮食上。经过山地时，一位农民不慎将粮食散落，几个职工就一点点拾起来归还原主[9]。住在德阳县红武公社的工人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帮助社员扫地、挑水，一位六十多岁的大婶说：“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工人比自己的亲人还亲，他们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我活了六十多岁都没看见过这样好的人。”[10]针对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三线职工医院采取对口援助的方式建立起联合诊所，并派出医护人员搞定期巡诊。为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三线单位帮助生产队建立了数量不等的农村学习室和夜校，教农民读书识字，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都觉得“这下可好了，工人老大哥帮咱们学文化，以后就不当睁眼瞎了”[5]。

三线建设期间，绵阳云集了数以万计的建设者，这是当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来

自五湖四海的“三线人”把自己的地域文化带到了这里,通过不断的接触交流,绵阳的农民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在1968年前后,长城钢厂的上海籍职工喜欢穿一种“小管裤”(裤脚较窄,约4.5至6寸),这种裤子比当时常见的直筒裤贴身且显得更为精神。农村青年男女觉得很“洋气”,便有意模仿,“小管裤”迅速在江油流行开来,成为颇为有趣的“亮点”。从饮食方面看,绵阳本地人原本很少食用螺狮、田蛙、泥鳅等水产品,误认为吃了之后会得怪病。而对三线职工来说,它们却是难得的食材,吃起来总是那样津津有味。一段时间之后,农民的观念改变了,这些水产品不但走上了他们的餐桌,还成为款待亲朋好友的首选。从居住习惯看,随着辽宁籍工人在绵阳落地生根,带有“火炕”的房屋逐渐被农民接受,涪江之畔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东北风格的居住区。三线建设者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乡村社会固有的封闭与保守,让农民接触到了新的事物和信息,促使他们更新了观念,开阔了眼界。围绕三线建设形成的工业文化是包含了多种元素的混合体,各种原本存在于不同空间、地域的文化形态被人为因素糅合在一起,异质性因子彼此碰撞、影响、渗透,最终相互融合,构建起新移民与“土著”之间共同的精神家园。

二、以农助工:广大农民对三线建设的支援

三线建设全面铺开后,绵阳的广大农民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带领下,掀起了支援三线设的热潮,他们与工人们一道完成了大量的基建任务,并在地方建材生产、蔬菜供应等方面出力颇多。尽管从发挥作用的大小来看,农民无法与三线职工相比,但不可否认,农民是三线建设的助推剂,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劳动与付出,才保证了三线项目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向前推进。农民为三线建设做出的贡献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参加基本建设。时间紧、任务重是三线建设的显著特点,繁重的基建任务如果仅靠三线职工的力量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因此,绵阳动员了大批农村劳动力参与其中,据统计,全区各公社仅在1965年就有154.9万人次投入建设,全年新修公路208.4公里,架设高压输电线123.5公里,安装输水管道3.8公里,平整场地28.5万平方米[11]。在江油电厂扩建过程中,许多社员主动要求延长工作时间,挖土、搬砖、运钢筋、搭架子,哪里缺人就到哪里[12]。1966年4月,为铺设天然气管道,广汉县在几天之内就组织起了一支7500人的建设队伍。施工时,公社对社员实行军事化管理,公社为营、大队为连、生产队为排,由各级干部负责,分片包干。管线附近的公社采取打“突击战”的办法,社员早去晚归,中午在工地休息用餐,减少往返费用,离管线较远的公社则调配懂技术的民兵组成专业队上阵。为了激发社员们的劳动热情,许多公社不失时机的开展劳动竞赛和评优活动,各队间争夺流动战旗,每隔一段时间即召开一次评议会,表彰先进典型。有些公社还建立起临时的党、团组织,力争发挥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多种形式的动员,工地上形成了热火朝天的劳动氛围,涌现出了多位模范人物,如农建九排排长在挖管沟时不慎把脚弄伤,血染红了鞋袜,可他一声不吭,简单包扎后继续坚守岗位。有人劝他休息一下,他却回答:“为了支重,流点血不要紧。”[9]在他的带动下,这个排用4天时间就完成了原本10天的任务,有的女社员甚至背着小孩参加劳动,缺少搬运工具时,就拿自己的脸盆装泥土。

第二,生产地方性建材。三线建设初期,绵阳当地的建材生产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现为生产速度慢、从业人员少、产品质量低,各方面水平均无法满足大规模工业建设的需要。为了扭转被动局面,保障三线项目顺利施工,绵阳地委调集了大批农民投入地方建材生产。1965年上半年,全区迅速建成砖瓦窑454个,采砂人员最多时达5536人[13]。各县支重办不仅积极将原有的砖瓦社扩建成砖瓦厂,还购买制砖机分配给公社,号召社员生产。广元县支重办在交通情况较好的东坝、河西、宝轮、大石、荣山等12个公社开办小型砖瓦厂20余个,动员174个生产队的农户利用农闲时间烧制砖瓦[14]。江油县一个月内就建成砖窑100多座,农民在春耕期间仍挤出时间轮班值守[15]。通过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绵阳的建材生产情况有很大改观,到1965年底,全区向三线单位

提供砖 9000 万块，瓦 2000 万块，砂石 121.12 万立方[11]，基本满足了施工需要。

第三，保障蔬菜供应。随着建设项目陆续上马，绵阳的外来职工人数不断攀升，到 1965 年 12 月，三线职工及家属已达 111940 人[11]，这给当地的蔬菜供应带来很大压力，供需矛盾突出。为此，区支重办迅速组织农民扩大蔬菜种植面积，在粮菜混种地之外单独设立蔬菜基地，增加土地投放量，详见下表。

表 1　绵阳地区 1964 年—1967 年蔬菜种植面积变化情况

时　间	1964 年	1965 年	1966 年	1967 年
种菜面积	3746 亩	8746 亩	14970 亩	21558 亩
比前一年增加	——	≈133.5%	≈71.2%	≈44%

资料来源：根据《绵阳专区支援重点建设领导小组关于支援重点建设工作情的况报告》（绵阳市档案馆，74－1－1）、《绵阳专区蔬菜生产情况的汇报提纲》（绵阳市档案馆，74－1－18）等资料整理而成。

提高专业化程度，组建专业菜队是绵阳为解决蔬菜短缺问题采取的另一项举措。在地委的统筹规划下，各县均成立了专业菜队，实施“五定一包”（定面积、品种、数量、质量、时间、包收购）。有条件的地区给每个专业队配备技术员，指导农民更新种植方式，改低厢为高厢、茶盘厢为深沟宽厢，用浇灌代替淹灌，按照蔬菜的生长周期排开播种。经验丰富的农民还尝试阳畦育苗、温田育苗，改小苗移栽为大苗带土移栽，实行早、中、晚熟品种配套栽种，这样可以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率，缩短淡季时间。为了激发农民的热情，1965 年 5 月，绵阳对蔬菜生产政策做出调整，规定专业菜队免征公粮，折征现金；菜农口粮由每人每月 25 斤提高到 27 斤；对蔬菜基地每亩年供化肥 40 斤，缺柴地区的专业菜队由国家供应煤炭；凡属计划安排的专业队菜农，除按定量标准发放布票外，每亩每年再补助布票 4 尺[16]。这些做法消除了农民“重粮轻菜”的思想，使得绵阳的蔬菜生产连续 3 年超额完成原定目标，到 1967 年时，绵阳地区一年可以向三线单位提供蔬菜 6083.58 万斤，保证职工每人每天吃菜 0.56 斤[17]。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农民还给三线职工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提供了不少帮助。1965 年初，绵阳县农民为 651 工程指挥部腾出了近百间房屋，在勘察设计人员调研过程中，一些老人讲述了自己前些年“跑山”的情况，给技术人员解决山体滑坡问题带来了很大启发[4]。德阳县城南公社的农民把住在家里的三线职工当亲人，工人生病了，农民送水送药，把做好的饭菜端到床头，有的农民还主动替工人洗衣服、晒被褥，他们觉得职工们“天没亮就去工地，半夜里才回来，太辛苦了，不能不关心”[11]。由于舆论宣传和政策引导，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已经深入人心，绵阳的农民更是近距离感受到了“工人老大哥”夜以继日，艰苦奋斗的工作热情，“三线人”辛勤的“劳动”令他们钦佩。无论用政治伦理还是民间伦理来衡量，“劳动”都被视为一种美德，它是中国乡村社会中“德性”的生活化表征，是评判“好/坏”的重要标准。农民可能无法充分理解三线建设的意义，但他们眼中的“三线人”是代表着国家形象的“好人”，在党政部门的号召及朴素情感的双重驱动下，农民愿意为这些“好人”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工农之间的联系在这样的情境中得以密切。

三、影响工农关系的问题及其解决

就绵阳的情况而言，三线建设中的工农关系总体上处于良性状态。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总体向好的背景下，两者之间并非没有矛盾。由于很多三线项目是边调查、边规划、边组织、边设计、边施工（所谓“五边”工程），动工前没有形成系统、成熟的建设方案，因此难免会在土地征用、劳动力调配、建材使用等方面出现偏差。此外，一些工人和农民在工农结合、厂社互助的问题上存在认识误区，只顾及自身的利益得失，影响了工农关系的稳定。

第一，土地征用上出现的问题。三线建设开始后，中央曾做出“三不四要”的指示，提出“建厂

中不占或尽量少占农民的良田好地”,个别三线单位没能贯彻中央精神,引起了农民的不满。例如在1966年10月,江油县武都区红旗公社农民向绵阳地委反映,长城钢厂四分厂未履行申报手续就占用农民耕地,此后虽上交了征地申请,但并没获批,该厂便要求租用土地,在租用也未被允许的情况下,就用而不报。该公社第一大队第四生产队的土地被占用后,队里289名农民只剩下耕地64亩,农业生产根本无法开展[18]。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梓潼县交泰公社,某单位申报占地27.4亩,但实际占用面积却达62亩,而且未经公社同意便清除了已栽种的水稻,农民没获得任何补偿[19]。位于广元县的大明仪器厂、广平机械厂、长胜机器厂在没有确定动工日期时就禁止农民在计划征用的田地上种粮食,使得大片土地闲置,影响了粮食生产[20]。

第二,劳动力调配上出现的问题。为了加快建设速度,实现“四个当年”的目标(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建成、当年试生产),绵阳的三线单位在劳动力使用上呈现出用人急、要求高、数量大的特点。有的企业未根据国务院及四川省委的规定调配劳动力,任意将“短期工”变为“长期工”,“临时性用工”变为“季节性用工”,即使在农忙时节仍安排部分农民施工,导致公社没有足够人手投入农业生产。还有企业担心施工前临时组织人员来不及,于是提前五、六个月通知公社组织劳动力,当公社按要求完成任务后,这些企业却迟迟不安排上工。有的企业要求抽调的劳动力人数是实际用人数的一到两倍,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

第三,建材使用上出现的问题。在施工过程中,一些三线单位将建材需求计划定的过高,与实际使用额度相差悬殊。例如在1966年初,0821厂要求广元县提供100万斤杂竹,用于建造“干打垒”。该县几百名社员起早贪黑砍伐杂竹,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完成,然而该公司最终却只用了约14万斤[21]。东坝公社组织社员为某三线项目生产砂石约500立方米,结果工程指挥部取走一部分后就再未理会,进入雨季后,这批砂石还没来得及搬运就被河水冲走,社员们意见很大。有单位因种种原因拖欠建材款,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1965年末,旭光电子管厂先后从盘龙、红光、三合公社提走砖瓦15万块,但货款却久未结算,后经广元县支重办一再协调,该厂才支付了一部分。为了不影响社员支援三线建设的积极性,县支重办垫付了剩余款项[22]。

第四,思想认识上出现的问题。一些职工对三线企业支援农业生产不理解,他们只算眼前的“经济账”,声称“厂社互助”给企业增加了额外负担,帮助农民建水渠、修机器、改良土壤是“全民所有制的职工给生产队劳动,工厂吃了亏”。在公社和生产队里,少数干部和社员有依赖思想,认为找到了“大靠山”,主张“遇到困难就该叫,没有东西就该要”[23]。

面对上述问题,四川省委、绵阳地委及各三线单位采取了一系列解决办法:

首先,省委第二工业部、成都军区国防工业工作部、绵阳地委三方抽调干部成立联合工作组,负责统一审批三线项目的用地计划,监督各单位按照规定办理征地手续。在审批征地申请时,工作组要求三线单位做到“四个必须”(即必须有国家批准的选址定点文件,工程初步设计必须征得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必须有项目平面规划图,必须制定征地补偿办法)[19],征地申请获批后,三线单位要在农作物播种前与所在地县委沟通,以便当地及时调整农业生产计划。工作组还会不定期检查三线项目的用地情况,一旦发现未报即征、少报多征、多征少用的情况,立即要求涉事单位退还土地,确保“三不四要”原则得到落实。

其次,绵阳地委对劳动力及地方建材管理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要求三线单位需按季度编制临时工、季节工及建材使用计划,并得到所在系统上级主管部门批准,这些计划要在指定期限内报送县支重办。调派劳动力及组织砖瓦砂石生产时,三线单位要与周边公社协商,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进行。三线项目指挥部因临时任务需要调配的劳动力和建材,可报当地县委审查,就地就近解决。各建设单位编制的用工、用料计划要努力做到精打细算,节约使用杜绝浪费。凡是调配的临时工、季节工,任务完成后必须按时回到农村,不得超期使用。凡超期使用的,必须得到县支重办同意[24]。

最后，三线单位和各公社、生产队分别对职工和农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宣传动员，反复讲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农联盟的重大意义。为了能让厂社互助的思想深入人心，三线企业采取车间、科室与生产队对接的办法，发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到农民家里拜访，鼓励职工利用节假日轮流到公社参加劳动，做好“三带”工作（带政治、带生产技术、带文化卫生）。与此同时，通过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农民的觉悟也有所提高，最初那种“靠着大树好乘凉”的想法减少了。三线职工无私奉献、艰苦创业的事迹使很多农民受到了触动，一些生产队长反映：“过去当干部很恼火，每天出工要挨户喊，现在社员听话了，工作好做多了。”[25]

四、结语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十分关注如何处理工农关系问题。1964 年 5 月，在与国家计委领导小组讨论“三五”计划时，毛泽东把国防工业、农业和基础工业比喻为“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强调各方面发展要相互适应。为了贯彻这一思想，李富春于同年 9 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明确指出：“三线建设不仅要搞工业，而且必须依靠群众力量，积极发展农业。”[26]做到工农结合。绵阳三线建设中出现的“厂社互助”就是上述思想在基层的实践，它是备战时期党和国家为促进工农业共同发展而进行的新尝试。

诚然，受到种种原因的影响，处理工农关系的正确认识未能完全落实，但是从绵阳的情况来看，三线单位、广大农民和地方党委、政府巩固工农联盟的努力方向是明确的，工农间的关系基本上是良性的。三线建设虽是一场以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为核心的经济建设，但工矿企业、科研院所发挥了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了周边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民成为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受益者。另一方面，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推进三线建设，建立强大的后方战略基地，离不开农业和农民的配合与支援。广大农民的参与为三线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和人力资源支撑，满足了大规模工业建设的需要。为了解决三线建设中影响工农关系稳定的问题，四川省及绵阳地区的党委、政府在权力运作机制上进行了改革，研究制定出一系列新措施、新办法，达到了落实中央精神、协调各方利益的目的。时至今日，这些特定历史条件下维护工农互惠关系的思想与实践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我们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参考文献：

[1]段娟. 近 20 年来三线建设及相关问题研究述评[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6).
[2]中共中央西南局国防工业办公室. 对中共一三二厂农村工作委员会和省、市委工作组关于厂社结合试点的情况报告的批示[A]. 绵阳市档案馆：74－1－11.
[3]绵阳专区支援重点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重点建设单位支援农业的初步情况[A]. 绵阳市档案馆：74－1－1.
[4]651 工程指挥部. 651 工程工农结合相互支援的情况和下一步打算[A]. 绵阳市档案馆：74－1－11.
[5]中共江油县委工业交通政治部. 关于县境内各厂矿支援农业生产情况的报[A]. 绵阳市档案馆：74－1－15.
[6]第四冶金建设公司. 关于第四冶金建设公司积极支援农业抗旱情况的简报[A]. 绵阳市档案馆：74－1－15.
[7]绵阳专区支援重点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天然气管线建设会议之七[A]. 绵阳市档案馆：74－1－11.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江油市委员会. 江油三线建设[G]. [出版者不详]：2010：35.
[9]剑阁县支重办公室. 关于 1966 年上半年来支重工作的总结报告[A]. 绵阳市档案馆：74－1－12.
[10]绵阳专区支援重点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天然气管线建设会议之六[A]. 绵阳市档案馆：74－1－11.
[11]绵阳专区支援重点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 1965 年支援重点建设工作的情况报告[A]. 绵阳市档案馆：74－1－1.
[12]建筑工程部 106 建筑工程公司. 第三季度工作总结[A]. 绵阳市档案馆：74－1－14.
[13]绵阳专区支援重点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我区国家重点建设布点和上半年支援工作的开展情况报告[A]. 绵阳市档案馆：74－1－2.

[14]绵阳专区支援重点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支援国家重点建设情况的汇报[A].绵阳市档案馆:74-1-4.
[15]江油县支援重点建设领导小组.关于支援国家重点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A].绵阳市档案馆:74-1-4.
[16]绵阳市商业局.绵阳市商业志[G],[出版者不详]:1995:279.
[17]绵阳专区支援重点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绵阳专区蔬菜生产情况的汇报提纲[A].绵阳市档案馆:74-1-18.
[18]江油县武都区红旗公社.人民来信[A].绵阳市档案馆:74-1-12.
[19]中共四川省委第二工业部.关于召开绵阳、乐山、宜宾地区工作组会议纪要[A].绵阳市档案馆:74-1-11.
[20]广元县支重办.关于支援0821情况的汇报[A].绵阳档案馆:74-1-14.
[21]广元县支重办.关于支援0821劳动力和三类物资情况的汇报[A].绵阳市档案馆:74-1-14.
[22]广元县支重办.关于今年8月份以来支援0821砖瓦砂石情况的汇报[A].绵阳市档案馆:74-1-14.
[23]绵阳专区支援重点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当前支援国家重点建设存在问题和解决意见的通知[A].绵阳市档案馆:74-1-11.
[24]绵阳专区支援重点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我区1966年支援重点建设的劳动力调配工作的意见[A].绵阳市档案馆:74-1-4.
[25]中共绵阳地委.关于1966年支重情况的汇报[A].绵阳市档案馆:74-1-4.
[26]陈夕,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89.

Embedment and Mutual Assistance: a Microscopic Sca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in the Three Line Construction

CUI Yi-nan, ZHAO Ya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10,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60s, Mianyang became a center of the third-line construction in Sichuan province. The third-line corporation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were moved into Mianyang, which have improved the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enhanced collective economy and promoted the health and culture work in the local rural areas, and have brought changes to the daily life of the local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a large number of farmers set off the climax of supporting the third-line construction, they have done a lot of work in the basic construction, building materials production, vegetable supply and so on. Although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in the third-line construction, under the joint efforts of all parties, the problems were solved and the deviation corrected. The construction of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provided a strong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strategic rear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western areas, and offered a historical inspiration to handle the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urban and rural relationships in the new period.

Key Words: the third-line construc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urban and rural relationship;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western areas